

9·30运动和国家罪行第十八章 “回归社会”的真实涵义 上

原创 萧玉灿 印尼视角

来自专辑930和国家罪行

萧玉灿 著
萧忠仁 编
陈浩琦 译

“回归社会”的真实涵义

自9·30运动以来苏哈托军事统治者所进行的大逮捕和大屠杀，已经引起了西方国家人民的反应。全世界终于惊醒过来，意识到在苏哈托将军领导下印尼所发生的事情竟是如此令人发指。眼前的现实与1963年全世界在联合国听到的苏加诺总统演讲《重新建设世界》中所获得的认识是多么不同。在那个演讲中，印尼被描述为依靠潘查希拉的宽容的国家。潘查希拉是对各种不同的意见、意识形态和宗教给予宽容的国家哲理。

在苏哈托将军的统治下，政府已经犯下了国家罪行，其残酷程度超过了希特勒纳粹消灭犹太人。潘查希拉五项原则被践踏。在9·30事件之前曾经是纳沙贡理念重要组成部分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被以极其残忍的方式消灭。

西方政府最初确实是支持和鼓励在苏



在苏哈托执政期间，
很多人被逮捕或屠杀

哈托将军消灭印尼共产党和推翻苏加诺的政策。9·30运动之前，苏加诺大量接管外资企业的政策肯定损害了西方国家的地位和利益。外国企业对印尼财富的搜刮被迫停止。9·30运动后，消灭了印尼共产党和推翻了苏加诺，给了他们搜刮印尼自然财富的新机会。

但是，西方国家的人民后来也意识到苏哈托将军的行为违反人道主义法和侵犯人权。他们认识到苏哈托将军破坏了法治。他们还认识到，没有无罪推定的原则——法院判决前被视为无罪的权利，也没有公正的审判。西方国家也出现了群众运动，谴责必须对大规模屠杀承担责任的苏哈托军事当局，要求

释放政治犯。

国际特赦组织关注在印尼的事态发展，并坚决要求对印尼政府解决政治犯的问题，停止对共产党人和被怀疑信仰共产主义的人的残暴和不公正的迫害。

这就是矛盾。一方面，西方国家希望印尼奉行人道主义和人权。而另一方面，这些政府都严重依赖于跨国公司的支持，这些公司希望印尼为摆脱共产主义的影响，使他们能够不断地搜刮印尼的自然财富。这种情况导致西方各国政府无法对苏哈托将军施加重大压力以解决数以万计政治犯的问题。

但西方国家的压力多少有些成效。从1970年到1975年，新入狱者的数量有所减

少。1975年后开始逐渐被释放，尽管释放的数量很少。苏哈托政府把这释放称作“让囚犯回归社会”，往往还要举行仪式，邀请美国、荷兰和西德等西方各国大使和新闻媒体来见证。

西方国家与苏哈托军事当局之间的“合作”究竟是怎样的呢？这些援助国在印尼投资真的是为了印尼大多数人的利益和维护司法公正吗？

西方国家对印尼的要求可以概括如下：

1、释放所有9·30运动的政治犯和清理印尼所有政治犯，尤其是在布鲁岛的。

2、发布特赦，结束与9·30运动有关的拘留。

3、确保落实人权，创造民主环境。

这些要求推动苏哈托政府采取如下各种措施：

1、给1970年之后的出狱政治犯签发一份带有“城市软禁”（不许出城）或“完全释放”蓝色图章的证明书。事实证明，“完全释放”并非完全自由。此类人必须每个月去军分区报到一次。

2、军分区口头交代他们：

(1) 他们仍然

没有大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2) 如果想离开军分区管辖范围，必须先申请“通行证”。

(3) 如果要在同一个军分区管辖范围内搬迁，必须通报新地址。

(4) 如果要搬到另一个军分区管辖范围的新地址，必须先征得同意。

(5) 如果要搬到另一个岛，必须得到军区批准。

(6) 禁止加入任何政党或组织，也不得成立任何新的政党或组织。

军分区经常邀请“回归社会”的前政治犯，给他们作指示。军分区明确指出：

(1) 他们不得就有关他们被拘留期间的经历写书或文章。

(2) 不得向外国人谈在监狱的不愉快经历，尽管这些外国人获准采访前政治犯。告诉这些外国人的，必须是不会损害印尼好名声的事情。

(3) 禁止出国。

规定所有印度尼西亚公民必须持有居民身份证。根据内政部部长的指示，前政治犯的身份证，应给予特别的标记，在身